



《全唐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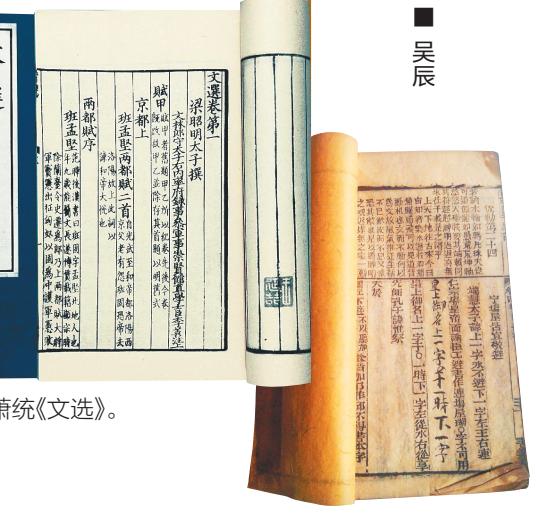
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文选》共三册全。

《唐诗三百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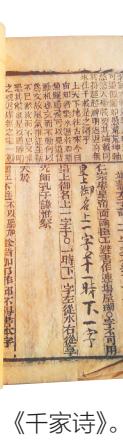
# 唐诗千年盈日月

■ 吴辰

如果说要选择一种文体作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代表，那么答案十有八九会是诗歌，而如果要为诗歌加一个年代限定的话，那么答案则一定会是唐朝。中国有灿烂辉煌的诗歌文化以及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曾经有“不学诗，无以言”的劝诫，而在大唐盛世，诗歌更是承载了整个民族的骄傲，不朽的诗歌、不朽的诗人，都成为了这个不朽时代的象征。千百年后，多少帝王将相的名字风流云散，但是诗人和他们的诗作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记忆里，它将与天地同在，共日月争辉。



萧统《文选》。



《千家诗》。

## 《全唐诗》其实不全

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里边所说的《唐诗三百首》当然确有其书，却也是自唐代以来种种诗歌选本的统称，毕竟有唐一代诗歌总数早已不可考究，仅流传至今的诗作保守估计也得有五万首以上，更何况还有大量诗作早已随着时间而灰飞烟灭，虽然我们与大唐已有千年之隔，但是随着考古的发掘，至今仍然不时有唐诗或残篇闯入我们的视野，仅以“三百首”概括唐诗虽然确能选其精粹，但也难免挂一漏万。且不说《唐诗三百首》，就连敢以“全”为名的《全唐诗》也远远未能达到“全”的程度。但是，通过各个版本的唐诗选辑，后人得以窥见大唐气象之一斑，而中华诗书文化也得以源远流传。

闻一多曾经描绘唐代，称凡是生活中能够用到文字的地方，当时的人们都会以诗的形式来表达，万事万物皆可以入诗。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充满了诗歌的语境，使唐代人早在自己的时代就知道他们必将创造一种不朽，于是，他们一边作诗、一边选诗，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诗选。有研究者统计过唐人所编诗选，其数量不下二百部，虽然选家眼界不同、选法各异，但是能被纳入诗家视野的，也必是各有所长。

早在唐太宗时期，贵为天子的李世民就喜欢时常召集一班文人雅士吟诗宴乐，于是便有了《翰林学士集》；而武则天当政时，曾召集四十七学士于内殿修《三教珠英》，四十七学士聚在一起，自然也不少了诗歌唱酬，于是又有了《珠英学士集》。当然，这些宴乐应制之作的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是这种选集的意识却是明确的。唐代人选诗的角度不拘一格，甚至可以说是刁钻，除了上述这类以雅集为主题的诗集之外，还有以地域分类的，例如收录吴中诗人诗作的《丹阳集》、以艳体诗为主的《玉台后集》、以收录唐玄宗时期诗作为主的《河岳英灵集》等等，至于友人之间的唱和、亲朋族人的互选则更是数不胜数。虽然一些选集至今只有名录存世，但仅从选集名称就可以大致推测作者的选集旨趣。

## 唐人选唐诗源自生活

唐代人好选诗，其影响来自晋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纂的《文选》，这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部文学总集，这是一部对后世流传甚广的选集，它不仅为后人集中展示了大量优秀的诗作，还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选诗标准。更重要的是，《文选》与唐代人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隋代开科举，《文选》中的章句、音韵等都是考官命题的重要依据，那么这样一部书受到唐代士人的青睐自然也是题中之义了。正如我们现在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一样，《文选》为唐代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学典范，杜甫就有诗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可见，即便是作诗到了能够被尊“圣”境界的大诗人，也对《文选》是推崇备至的。

另外，唐代人以诗进士，作诗成了他们理想意志的集中体现，为了使自己写诗有所借鉴，也需要大量去阅读一些堪称经典的诗作，古代的经典当然重要，但唯有当世的经典方能够体现大唐的气象，故而，选辑当世的诗作则成为了一件对唐代人而言严肃且有意义的事情。不难看出，唐人选唐诗，不仅为了艺术，更是源自生活。

据史料记载，从数量上来看，有唐一代诗歌的汇编要从清代所编的《全唐诗》谈起，号称“御制”的清编《全唐诗》是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诏在扬州设立全唐诗局，拣选了当时以彭定求为首的10位在籍翰林编选而成的。他们编修这部书非常仓促，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修成了，总共得诗48900余首，涉及2200多人。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不是特别准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重新进行统计，为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不包括神仙鬼怪类）。自《全唐诗》诞生以来，随着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加强，很多流传在海外的域外汉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这些文物和这些流传的古籍里，学者们又发现了很多《全唐诗》未收录的唐诗，据陈尚君先生估计，唐诗（包含五代）存世数量约53000首，作者约3000人。这组数字，远远超过了从《诗经》以来到隋朝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部诗歌的总和：唐以前的诗我们统称为先唐诗，存诗总量还不到10000首，涉及作者1000余人。我们所说的唐诗一般是指唐五代诗，一般把五代作为唐代的一个延续，也就是说唐诗的规模是唐前诗歌的5倍，唐代诗人的规模也是唐前诗人的3倍。

## 宏大的诗史书写

乾隆二十八年，这对乾隆皇帝漫长的一生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但是对中国唐诗的研究而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一年，自称衡塘退士的孙洙开始选编《唐诗三百首》。

在衡塘退士之前，对唐诗的选辑已经有很多种了，在此之前，最优秀的选本当属《千家诗》了，但是《千家诗》成型于宋代，经刘克庄、谢枋得等人之手，由繁而简，收录唐宋两代诗歌百余首。长期以来，后人对唐诗的研读、习作大多参照此书。但是《千家诗》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首先《千家诗》选诗的目的在于开蒙，诗作大多思想单纯、内容简单，且偏于以理喻世，故而就审美角度而言还是略显简单；其次，《千家诗》内中包含唐宋两代，而两代诗风大有不同，作诗理路也是迥然相异，唐诗重情，而宋诗重理，两者放在一起，其评判标准本身就成为问题；第三，《千家诗》所选诗歌缺少史观支撑，相邻或者相近诗篇中缺少内在逻辑理路，这也会让后世学诗者产生很多困惑。

鉴于此，衡塘退士在选诗时格外注意，他只选唐代的诗，并在书名中开宗明义点明，这只是“唐诗”三百首，唐以外历朝历代，诗作再好也不收进来，这就为唐诗选本的纯粹性做了规定，也能更好地呈现出唐代诗歌的特质来。更重要的是，衡塘退士在选诗时有意识地以体裁为经，以时间为纬，编织起了一套完整的唐诗发展历程体系，并将唐诗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展示在了读者面前。从七十余位诗人、三百多首诗歌来勾勒大唐文化盛景，虽然并不全面，但也足够让后人领略其风采，五言七言、古诗近体、律诗绝句，分门别类，也让人更加明晰地看到唐诗内部的复杂景观。

有人说先是有了《唐诗三百首》这部书，有人说先是有了书才有了谚语，还有人说衡塘退士之所以编著《唐诗三百首》是受到了孔子选《诗三百》的影响，孰先孰后，孰是孰非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唐诗三百首》让无数后人系统地看到了唐诗发展的历程，看到了大唐由盛极而转衰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也将一种来自民族血脉的诗意植入了喜爱诗歌的人们心中。

如今，我们翻开《唐诗三百首》，我们读到的并不只是一行行令人遐想的诗篇，更是读到整个大唐的历史，读到中国文化的血脉，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而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唐诗三百首》出发，我们民族文学将会更加灿烂辉煌。

## 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 肖伊绯  
史话春秋

1917年这一年，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而言，都是相当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新年伊始，陈独秀应聘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有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也迅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前沿阵地。

这一年开年新刊，元旦之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中，陈独秀以“记者”名义同时转载了两篇演说词《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和《蔡子民先生之欧战观》，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然而，就在《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一个多月之后，蔡元培发现演讲词中有一些记录错误之处，及时做了更正与声明。谁也不曾料到，此事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争论与国内流行之热潮。

刚刚履新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因为这些错误得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并为这一新奇学说的独特魅力所吸引。随后，即有意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开始多方联络筹划，为之紧锣密鼓地安排布置。

1921年4月15日，由梁启超主编的《改造》第3卷第8号，封面头条是一篇名为“相对论”的长达15个页面的“雄文”，作者是诗人徐志摩。文中提及，约于1920年秋，著名学者任鸿隽、饶毓泰，以及正在访华的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均已在南京的学术讲演中，主题论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知当时不仅有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学术群体，南京及沪上的各路学界精英，也都对爱因斯坦学说报以热切关注。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之后，各界痛悼诗人遇难之际，林徽因所撰《悼志摩》一文里，又再次言及徐志摩对“相对论”学说的热衷，称徐志摩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且梁启超对相对论的知识即从徐志摩此作得来。

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内“相对论”流行热潮同步，1921年初，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遍访西方学界名流，在法国巴黎访问伯希和、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学者之后，又于3月16日，与夏元瑮等在德国柏林面晤爱因斯坦。当蔡氏表达了邀请其访华讲学时，“答甚愿，但须稍迟”；甚至还谈到了在华讲学应用何种语言的问题，蔡氏“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

此次面对爱因斯坦的情形，被简要记录在了蔡元培本人的日记中。

答以“甚愿，但须稍迟”访华的爱因斯坦，果然于一年多之后，于1922年11月13日，抵达中国上海。然而，此行并非专程访华，而是赴日本讲学，次日即启程离去，经停上海只此一天。1922年12月31日，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虽再度乘船经停上海，却只是在沪上度过了1923年元旦之后，于次日即刻登船返回欧洲，从此再未步入中国。

虽然在上海经停的时光短暂，但爱因斯坦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其婿所撰《爱因斯坦传》，据其当时的旅行日记，对其短暂停上海的中国印象予以了这样的表述：“上海的访问，使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看法。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离开上海不到五年之后，时至1927年2月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爱因斯坦即致信会议主办方，明确表示支持大会主旨，坚决反对欧美列强掌握世界大权的国际格局，号召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团结，反抗不合理的国际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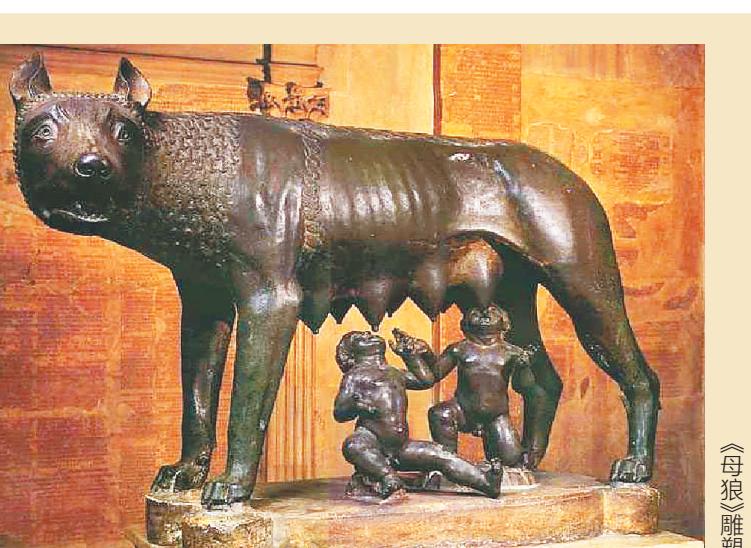
之后不久，又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公然践踏国际约法，攫夺我国东北三省主权。日军还接连制造“一二八”事变，将战火转移至远东大都会——上海，更令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各国人士，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曾经在上海有过短暂经停，更在此转赴日本有过专程讲学之旅的爱因斯坦，对此深感震惊忧愤，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拍案而起，奋起呼呼，“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

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又接连制造“八一三”事变，战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与曾访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坏，为维持和平道德，特倡议各国人民，组织对日货之自动抵制，不售战争材料，凡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项，当停止合作……今当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给予中国，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有之军队，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

在个人积极声援中国抗战期间，1937年初，爱因斯坦还与杜威、孟禄等15名美国学者，联合致电蒋介石与孔祥熙，请求释放被抓捕入狱的邹韬奋、章乃器等“救国会七君子”。电文中称，“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

抗战胜利后，1947年12月16日，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的中国学者罗忠恕，应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之邀，于当日上午与爱因斯坦面晤。此次会面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学界所有过往交集的最后“定格”。

（据《北京青年报》，有删节）



《母狼》雕塑。

## 鲁迅饮酒不贪杯

■ 姚秦川

自然见长。

不过，令人赞叹的是，虽然鲁迅的酒量不小，但他很少贪杯。许广平曾如此描述丈夫的酒量：“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如果有工作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贪杯的。他的父亲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很深刻，所以他饮到差不多的时候，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酒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时，他也会放任多饮些，却从不过量。”

鲁迅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他的日记

里，常见到与朋友宴饮的记录，他和郁达夫、许寿裳等人都曾饮过酒。比如在1921年的10月2日那天，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周末休息，这天上午马幼鱼、朱遏先等人来访，冀贡泉还特意送了我一瓶汾酒，大家喝得颇为尽兴。”

而在《郁达夫日记》中，也有过鲁迅喝酒的记录：“午后，与老友打了四圈牌，事后，想睡却睡不着，于是就去找鲁迅聊天。他送了我一瓶绍兴老酒，金黄色，有八、九年的光景。改日挑个好日子，弄几盘好菜一起来吃。”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鲁迅喝酒多为

和朋友在一起，喝起酒来也是理性的，节制的，很少酗酒。

在大家一起喝酒时，鲁迅向来是酒桌上的中心人物，他对于任何事情，本来就有自己的鲜明主张，因酒精刺激后，则主张更显精辟。而与知心朋友一起喝酒，鲁迅向来是谈笑风生，根本不似表面上那样严肃和不易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为了身体健康着想，鲁迅几乎将酒完全戒掉了。这一点，要是放在平常喜爱喝酒的人身上，还真不容易做到，但鲁迅却坚持了下来，着实令人赞叹！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